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研究处

纪念马克思逝世 一百周年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1883 — 1983

说 明

为了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校写出了一批论文。兹
将其中一部分汇集成册，以供参阅。

科 学 研 究 处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揭开历史之谜

——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 陈先达 靳辉明 (1)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 肖 前 李秀林 汪永祥 (35)

从启蒙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杨宪邦 (54)

略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丁常春 (80)

创建新世界的伟大旗帜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黄达强 严宜生 张泽森 (98)

试论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罗定炅 丁叶来 (125)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杜康传 (143)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王家勋 (160)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郑建邦 (184)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理论刍议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徐 禾 (202)

《资本论》和社会主义财政金融

理论建设.....黄 达 袁振宇 (216)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与会计理论建设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阎达五 (234)

学习马克思论会计职能的一点体会 ……赵玉珉 (245)

《资本论》和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 ……陈 共 (256)

马克思固定资本再生产理论

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鍾成勋 (277)

学习马克思关于商业的理论

重视商业加强商业改进商业 ……贸易经济教研室 (303)

从马克思主义体系

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 ……刘树声 (315)

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的理论

是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杨兴斌 (325)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胜利

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深刻危机 ……李宗正 (342)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结构

及其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朱立南 (352)

学习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刘 铮 (365)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报刊思想初探 ……童 兵 (383)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报刊

阵地的开拓 ……张之华 (412)

马克思论文学的本质特征的思想体系 ……陈传才 (438)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思潮 ……陆贵山 (457)

用社会主义文艺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文艺和道德的论述 ……周忠厚 (476)

马克思究竟怎样谈论艺术的本质规律？ ……………蒋培坤（496）

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郑杭生（517）

揭开历史之谜

——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陈先达 靳辉明

一种思想体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同它所蕴含的真理性颗粒成正比，而同历史的长度成反比。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名噪一时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恩格斯在评价圣西门时说过：“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注意之后，就从社会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①

可是，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与时俱进，历史日益显示出它的真理性和巨大力量。在马克思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以来的一百年中，马克思主义越出了欧美，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它经历了许多次革命风暴的考验，成为引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战斗旗帜。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我们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卓越典范。

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学说的伟大创造者，这位雄踞理论高峰的思想巨人，在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揭开了历史之谜，在人类历史观上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页。

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去了，这只是就它的理论意义说的，实际上唯心史观并没有消声匿迹，相反它力图把唯物史观挤出去。这是一场拉锯战。但是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重新宣扬“神创”说和“宇宙精神”之类的东西号召力不大，唯一能同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的是人本主义学说。

毫无疑问，人的问题应该研究，但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把人的问题归结为探求人的本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幸福论”，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步兴起的各种关于人的学说，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不乏可供思考之处，但无庸讳言的是，其中存在着一种企图以人本主义来代替、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本主义，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解决了的问题又重新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总结一下人类认识史，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发现史，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是有益的。

问题与答案：从神到人

正如自然有自己的秘密一样，社会领域也有自己的谜。这个历史之谜是人类社会实际问题的理论反映。各种社会历史观，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问题提供答案。尽管思想领域纷纭复杂，但把它作为认识史来看，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这是整个理论思维的共同规律。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观点起很大的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正在于，他揭开了复盖在人类社会机体上的帷幕，对历史之谜提供了一个同以往历史观根本不同的科学答案。

但从人类的认识来看，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神到人的过程。

认识总是从感性的客体开始的，自我认识是比较困难的。个人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人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当人类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开始揭示某些自然现象的规律时，而对自身活动的认识还处在浓重的神学迷雾之中。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说明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处于支配地位，“神”是人们回答历史之谜的总答案。例如奥古斯丁宣扬上帝不仅是自然秩序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认为奴隶制的出现，“不是越过最高上帝的指导，而是依照最高上帝的指导”，他还以神的名义劝告奴隶们安分守己，俯首帖耳，说“使徒警告奴仆们要顺从他们的主人，并且愉快地、善意地服侍主人”。^②托玛斯·阿奎那也公开宣称：“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并证明使徒言论不谬：‘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还说：“除非得到较高神灵的帮助和启发，人就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的一切事情。”^③神，横在人与社会之间，堵塞了认识社会历史的一切通道。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页。

③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0、97页。

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学说，但不是历史上任何有关人的论述都是人道主义。无论是西方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是东方孔丘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称之为人道主义学说。前者是认识论的命题，后者是道德原则。事实上他们都是不平等的公开拥护者。普罗塔哥拉维护奴隶制，而孔丘的政治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并宣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明显地把妇女与劳动者排斥在“人”之外。

人道主义思潮的特点，是赋予“人”以普遍的抽象形态，并把人从作为认识的主体、伦理的主体变为政治的主体。人道主义思潮虽然很广泛，包括哲学、道德、文艺、美学各个领域，但贯穿其中最核心的是一种政治理想。人道主义关于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从实质上说，是要求建立一个与他们设想的人性相适应的社会。美好的社会，美好的国家，美好的制度，应该是同人性相一致的。从早期人道主义者皮科、斐微斯、爱拉斯谟、蒙台涅倡导人的自由与尊严，到法国启蒙学派以自然权利为根据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人的本性的理论，都是为在封建母胎中逐步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舆论准备。尽管许多人怀着真诚的动机、善良的愿望、饱含着对人类的同情，以为是在为“人”服务；尽管他们以为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迷信、没有偏私、没有特权、没有压迫、阳光普照的天国，实际上是被他们“人性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自以为是按照人性来建立制度，实际上是按照他们追求的制度来构思人性。而这两者——他们追求的制度和对人性的理解——都是历史的产物。

当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曾经是进步的思潮。在几百年中，在许多领域产生过不少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名篇佳作。而且严格说来，人类从认识自然返回人类自

身，以社会为对象，主要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文艺复兴开始的。他们把人与神对立起来，以人为中心，倡导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力图摆脱神学的羁绊，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卢梭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 他自己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中，就致力于这种研究。突出人而不是突出神，从人本身探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根据，这是一个重大变化，预兆着揭开历史之谜的新方向。

但是人道主义者只是迈出了一步。他们的巨大功绩是从天国降临到人世，但并没对历史提供真正科学的答案。正如古代的炼金术士寻找“哲人之石”一样，他们也企图找到一种能解释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终依据，这就是人性。尽管各种人道主义派别赋予人性以不同的内涵，从而使人道主义具有多种色彩，但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把人性作为历史的尺度。人性的尺度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它是合理事物之所以合理的标准，又是一切不合理事物之所以不合理的标准。人性是最高审判官，一切聚讼纷纭的有关人类行为合理性和社会制度是否公正的争论，都诉诸于人性的法庭。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开创的由神到人的转折，从根本上说只是由神性进到人性，而没有达到现实的人。

但是，这种转折对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是足够的。资产阶级从中世纪的农奴变成城关居民，并逐渐壮大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它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解放的问题。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束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妨碍了商品的平等交换；资产者虽然拥有资财，但作为爆发户而被排斥在上流社会之外，为那些夸耀自己的“族徽”、“纹章”、“谱系”的封建贵族所鄙视。资产者有“财权”（私有财产），但缺少“人权”（资产阶级的

^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

公民权），痛感缺少作为“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即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各种权利，因此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他们的口号必然是：人，把人的价值、尊严、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提到首位，而且为了论证它的合理性，把它移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确立自己的统治起，这种所谓符合人性的制度的确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其中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详细的回答。但是他们对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究竟什么社会力量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仍然是求助于人性。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弊病中不是得出反对抽象人性论的结论，相反是认为人类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天性。他们在政治上超过了法国启蒙学派，而在理论原则上是他们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因此从历史观来看，他们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还是处在从神性到人性的阶段。

历史经验证明，只是从人与神的对立角度来看待人，就不能跳出抽象人性论的圈子，费尔巴哈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在德国的具体条件下，再现了从神到人的过程。他以人对抗神，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显示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战斗性，但正因为停留于人与神的对立，而没有进入人与人的对立，因而没有突破抽象人性论的壁垒。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① 费尔巴哈正是以这种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他明确地说：“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他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1962年版，第434页。

以人性作为历史的尺度，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么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始终在这个困难的迷宫里徘徊。强调人、强调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道主义者，反而变得不能理解人。卢梭就有这样的感叹，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变得更不能认识人类了。”^①。

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他把历史看成是个有规律的过程，不是在人性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即在他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去寻找这个规律。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的观念是卓越的，至少是把从十七世纪意大利人维科开始阐发的，经过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逐步发展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是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而是转移了矛盾。正如人道主义者把人性抽象化一样，黑格尔把人的思维抽象化为绝对观念，从而把人性与历史的矛盾变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但是，他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却为走出这个迷宫指明了一条出路。

真正解开这个连环锁，揭开历史之谜的还是马克思。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历史之谜的答案存在于历史本身。正如恩格斯说的：“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②而且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也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人们往往容易片面地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似乎它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其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主要不在三个来源之外，而在它之中。

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综合性的批判、吸收、改造，就孕育着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当然不排斥马克思研究历史和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跳出了延续几个世纪之久在人性中寻找答案的老套子，找到了一条不同的途径。正如恩格斯说的：“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①。所谓相反的道路，就是不局限于人与神的对立，以人性为对象，思辩地探索人的本性，而是“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②。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③。任何科学都是研究规律的，不研究规律就没有科学。马克思不是重复从神到人的过程，而是由人进入社会，探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揭开了历史之谜。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

人类用了几百年时间，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过程，而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中达到了高峰。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因此，在他思想形成的一定阶段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唯物史观的萌芽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相交错：一方面，他强调研究人的“社会特质”，主张“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④，表现了对费尔巴哈的某种“超越”；但另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452页。

一方面，他又认为“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①，对费尔巴哈的“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②的观点表示某种赞同。

但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终于找到了摆脱这种理论困境的出路。这就是，他把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人的世界”，揭露“市民社会”的秘密上。正象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样，费尔巴哈提出而没有回答的问题，“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③因此，要对人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必须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他通过对人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的探讨，转向以社会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逐步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关于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甚至可以说，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同以往一切哲学家对人和认识的根本分水岭。

但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经历着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和理论上的深化相伴随的。为了真实地揭示这一过程，说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何以实现的，不妨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分为萌芽、接近和全面制定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是以生产关系思想的成熟程度为标准

的。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还是把理性自由视为人的本性，把国家看作人类理性的体现和普遍利益的代表。但是，社会生活的推动和对物质利益的初步探讨，使他已经开始触碰到考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18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261页。

国家生活时，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必须重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①。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为解决《莱茵报》所遇到的“苦恼的疑问”而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他将上述朦胧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明确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地，市民社会才是决定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的真实基础^②，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这里所谓“市民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③。将物质关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法的现实基础，无疑具有开创新世界观的奠基意义，然而，马克思这时还没有从物质关系的总和分析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所以，市民社会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

1844年，马克思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接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④，从而使他开始触摸到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关于生产关系的重要范畴。

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已经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和占有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认识到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经济根源。但是，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相反，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把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大收入，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三大阶级的存在看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这样，不仅掩盖了资本剥削的实质，而且更不可能从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揭示出这种不平等分配的原因。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252、253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